

2014 年 3 月  
第 1 期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March 2014  
No. 1

## “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海外华人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万来志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 D634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2-5162 (2014) 01-0074-02

2013 年 12 月 16—17 日, 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 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行, 来自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 20 余名学者与会。会议围绕中华文化跨境传播的路径、方式等议题展开。

### (一)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与方式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元生以儒学在海外传播为切入点, 通过对港台“新儒学”、“新加坡儒学”及“波士顿儒学”三者进行比较, 认为港台“新儒学”是继承的典范, “新加坡儒学”是整合的典范; 而“波士顿儒学”则是创新的典范, 并由此引申出对“文化迁徙”与“跨境传播”的思考。马来西亚学者、中山大学教授陈志明认为, 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主要依靠中文和中文教育(如哲学思想等)、口传和日常生活(如节庆等民俗文化活动)等方式, 指出海外华人通过民俗文化的传承、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体验及习性等载体, 加强了对自身族群的认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刘宏认为, 东南亚华人在中华文化的境外传播中经历了个人、自发、表层文化; 国家、自觉, 从中层到深层文化; 个体/组织、自主, 在表层与深层之间等三种层面, 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推手、内涵、受众、作用与影响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其传播过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这不仅需要各方多增进交流与沟通, 同时还要让海外更多地了解中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李元瑾在比较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三国在传播中华文化的差异后指出, 三国分别采取了政治主导的“以文保根”、教育主导的“以校保根”及宗教主导的“以教保根”模式, 认为三国在中华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从同轨到分道, 从互动到疏远, 从中国元素主导到本土元素主导的变化, 在受到西方文化与回教的文化挑战时, 都做出了积极反应, 并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

### (二) 侨乡传统文化与侨居地的联系与互动

中山大学教授陈春声认为, 进入近代后, 侨乡地方传统出现了断裂, 因而传统乡村社会史如何与“华侨华人”历史解释相连接, 如何把地域文化传统与近代“侨乡”概念及“华侨华人”的历史解释相连接, 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台湾金门大学教授江柏炜以新加坡金门人的社群与乡团为切入点, 把以商人阶层为代表的金门会馆和以劳动阶层为主的浯江公会作为研究对象, 认为华侨华人“同时存在”于侨乡与侨居地社会, 并发挥了关键影响力, 因而要从社会网络的角度重新思考侨乡家族、宗族及其聚落的特殊性。

厦门大学教授曾玲考察了东南亚华人在民间信仰中的跨境“移神”与“家园”重建问题, 她认为, 作为东南亚外来的宗教形态, 华人民间信仰传承自中国民间宗教, 历经一个构建与演化

的历史进程。她指出，透过神的世界，社群之间、种族之间可以和平友好相处，这是文化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对于中华文化扎根于世界各地起到了巨大作用。厦门大学教授李明欢就中华民族“根”文化的跨界思考作了发言，她提出，在中华民族“根”文化中“界”的构建是由生存策略与心理需求、家族记忆与代际传承、时代变迁与理性呼唤等因素造成的，并指出“根”是一种文化，具有某种普世价值，同时强调“根”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海外华侨华人对祖籍地的认同。

### （三）中华文化的“本土化”演进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安焕然从“文化中国”、“文化马华”、“文化新山”三方面展开论述，指出海外华人文化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和自觉性，而侨居地与中国并不矛盾，可以兼容。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廖赤阳则通过对日本文化内涵中的“器、形、道”三个层面的考察，认为历史上日本进进出出于中华文化圈，具有很强的自主选择性。同时指出，在接受一种新文化时，必须跨越一些障碍才能真正将其核心精神吸收到自身的血脉之中，以实现本土化。厦门大学教授张侃在分析了越南会安17—19世纪华人跨境家庭和妇女生活情况后指出，对华商来说，必须学会进入到以妻子家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这种互动与融合常常能反映出他们的本土化程度，也说明华商除“华人兄弟网络”之外，以妻子为核心的合作关系网络也具有一定的基础性功能。同时，妇女在会安华人家庭中所体现出的独特性别属性和在当地社会扮演的多元角色，使她们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文化内容，集中展现了文化合成的内涵。

### （四）对“文化中国”内涵的反思

新加坡新跃大学教授郭振羽认为，如果把杜维明教授提出的“Cultural China”译为“文化中国”，就不能超脱“中国”一词的地理涵义及其作为国家的政治涵义，也就无法脱离中国本位霸权的内涵。因此，他建议以具有历史和文化意涵的“中华”替代偏重地理和政治意涵的“中国”。曾玲教授则认为，如果“文化中华”没有中心，强调多元化，那会不会有共同性的特质？会不会有否认共同性之嫌疑？陈志明、庄英章等教授认为，“文化中国”概念只是讨论了儒学、精英之学，但对于民间信仰、普通民众的文化等没有太多涉及，而如果加入这些内容，“文化中国”的内涵可能更丰富。日本学者、中山大学教授滨下武志认为，如果改“文化中国”为“文化中华”，是否有重复之嫌？因为中华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两个“文化”叠加在一起，是否有意义？

### （五）海外华人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方向

滨下武志教授认为，区域全球化研究应该形成一个互动的网络，因而在做海外华人研究时，应把华侨、华人、华裔和归侨等联系起来，以便形成整体性。要把维持当地文化、适应当地文化、新开全球文化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并要注意全球化里面的地方民间文化传统和移民文化传统在不同地域中的表现，应从地方看全球化。刘宏教授提出，要关注对海外华人间的各种联系网络和纽带的研究以及海外华人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同时，华人的形象与影响力，中华文化在跨境传播中的政治因素等方面也需要更多的关注。曾玲教授则建议进一步深入研究当代华人与中国因素的脉络如何与历史学的研究相结合，加强对华人文献的使用、收集和多文化中的比较研究，理论研究要更加“接地气”。陈志明教授认为，未来可在一个大的跨境框架下，把海外华人同中国地方的研究联系起来，并指出，海外民间宗教、海外建筑风格、饮食文化方面的研究潜力还很大。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庄英章认为，要从大陆和海洋的双重角度来研究“东南亚”，还可在亚洲季风的脉络下研究再移民以及华人与西方势力、当地土著互动方面的问题。